

USSR

苏联

翻译理论

蔡毅 段京华·编著

TRANSLATION
STUDIES IN USSR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

许均 主编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utside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USSR

苏联翻译理论

许 均 主编

TRANSLATION
STUDIES IN USSR

蔡 毅 段京华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总 序 -

许 钧

20 世纪就要过去了,人类即将迈入新的世纪。在新旧世纪的交替时期,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哲学社会学科,似乎都无一例外地在作自身历史的回顾,同时思考在新世纪的发展。20 世纪,对翻译学科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 6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向系统、科学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翻译学科在不断发展,在与其相关的学科群中的地位日渐提高。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相当深入地考察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参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 月版)。回顾近二十

年来中国翻译界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深切地感到,翻译学科的发展,任重道远。无论在学科的体制上,还是在翻译研究中,我们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也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我曾就我国近期译论研究的状况、目前译论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译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谈到,在目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倾向,十分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一是翻译文艺学派对语言学派的绝对排斥倾向。从最近一些翻译研究和外语教学的刊物所刊载的探讨翻译的文章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不少译论研究者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译论主张,将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标为文艺学派。在译论研究上,有自己的明确的理论追求和主张,并以此为基础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起自成一体的学派,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事。然而问题是,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在对翻译的探索中,我们往往处在种种矛盾之中,如艺术与科学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创作和摹仿的矛盾,原作者与译者的矛盾等等,这诸多的矛盾使我们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习惯,致使翻译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往往相互排斥,水火不相融。二是中西译论的相互排斥倾向。在许多不同场合,我曾谈到在近十几年来的译论研究中,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如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而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总之,是不科学的;而另有一些研究者则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没有指导价值。目前,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排斥的倾向仍然存在,甚至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我们认为,翻译

研究应该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诚如罗新璋先生所说,“任何一种翻译主张,如果同本国的翻译实践脱节,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渊源的崭新译论,可以时髦一时,终难遍播久时。”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会遇到许多带有共性的问题,也会在几千年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一些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理论研究不能与本国翻译实践相脱节,并不意味着对别国、别的民族的翻译经验或理论研究成果的排斥。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看,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三是翻译研究的片面性倾向。翻译研究涉及的面很广,涉及的问题很多,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翻译学科的建设并不是一些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的简单相加,需要有一种整体的意识,宏观的加以把握并致力于理论的系统化,不然翻译研究就有可能因支离破碎,缺乏系统化而丧失其科学性。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深化翻译研究,进一步加强翻译学科建设,是摆在每个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近几年来,译界不少有识之士实际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杨自俭先生多次指出,译界要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不要用中国排斥外国的,也不要外国排斥中国的;不要用微观研究排斥宏观研究,也不要宏观研究排斥微观研究,而是应该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功夫。这里谈的,不仅仅是方法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我国译学建设的方向问题。译学研究要有理论意识,学科意识,这是翻译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上的保证。而要在实际工作中,把翻译研究推向深入,势必涉及到对中国文化遗产、传统译论如何对待,如何继承的一面,也涉及到对外国译学的优秀成果如何借鉴,如何吸收,融合的一面。最近读了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思

想研究》，沈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态度也十分积极，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严复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去创立和发展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外国已有的译论研究成果中去吸取营养”。我很赞同这一观点。我们都知道，翻译研究历史悠久，西方的译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的一篇题为《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公元前46年）的文章，我国的译论则以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约公元244年）为发端。在传统的译论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附有哲学、文化和语言的思考，在对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中西方译论有不少共同点，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认识、要求、乃至标准等，也有相异的地方。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方译论家基本上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注重翻译原则、标准、过程以及具体方法的探讨，更多的是翻译的微观研究，对翻译本质，翻译理论体系，翻译价值等诸多重大问题缺乏交流与沟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译论家中有部分学者提出译论研究相互交流的重要性，指出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使翻译研究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必须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对翻译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挖掘翻译的本质内涵，客观认识与正确评价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比较与梳理中西译论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成果，构建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翻译教学理论。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上展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们的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从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为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翻译界有目共睹的贡献，《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中国

《翻译词典》就是个明证。我认真读过丛书责任编辑唐瑾女士在1995年6月写的那段“编辑的话”，她对翻译事业的关爱和对译学建设倾注的心力，特别是随着她所策划和责编的一部部翻译研究著作的问世，使我看到了我国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在新世纪的希望。所以，当我有意组织国内译界从事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对外国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促进中外译论的交流时，我想到了她，写长信与她谈了课题的研究设想和具体计划，没想到唐瑾女士当即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加以肯定，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并与我多次商量，定下了编撰《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一些原则性意见。

首先，我们认为，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有翻译实践，就必然有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探索与研究。中外译论在长期的发展中，对翻译以及对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着各自的认识，有同有异。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国家，翻译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前苏联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法国的释义派理论、翻译诗学理论，德国哲学思辨与文化思考相结合的翻译研究，英国的“翻译研究学派”，美国的多元翻译理论以及加拿大的双语交流与翻译研究等等，对我国的译学研究都具有启迪意义。无论是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史，还是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研究，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之内。各个国家不同的研究途径、方法，也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第二，我们展开这项工作，既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也是从我国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我们看到，目前在国内翻译研究与教学中，国外的翻译研究资料相当缺乏，加之语言的障碍，各语种的翻译研究与教学人员，基本囿于各语种手头有限的一部分资料，对开拓研究视野，吸取外国译论研究的成果，有很

大的障碍。《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既可作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补充,促进中外译论的交融与发展,也可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同行和有志于翻译事业的广大学生提供帮助。

第三,本丛书以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促进国内译论研究的发展,加快翻译学科的建设为目的,在掌握近四十年来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成果和资料,了解其现状,把握其趋向的基础上,按国别,有选择地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系统的研究与评介,介绍与评论相结合,力求有介绍,有评论,有比较,有分析。

第四,我们的翻译研究要体现一种开放、创新的精神,本丛书为一种开放性的丛书,除了前苏联、美国、法国、英国等国之外,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翻译研究也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有关成果,将视国内专家研究的实际进展,适时推出。

从我们提出研究课题和设想开始,到研究工作的实际展开,我们得到了国内外翻译研究专家和有关翻译组织、机构和大学翻译系的支持。国际翻译工作者联盟、《巴别塔》与《国际译联通讯》编辑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翻译委员会、法国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加拿大《媒他》编辑部等,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际知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纽马克、巴斯奈特、威尔斯、塞莱丝柯维奇、阿埃瑟朗、让·克洛德·热玛尔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林茂孙先生、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青岛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香港翻译学会刘靖之先生和岭南学院的张南峰先生,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本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译学建设

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于南京玄武湖畔南京大学公寓

1999 年 7 月 4 日

绪 论

苏联的翻译理论在世界的翻译理论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苏联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十月革命后不久便开始了,是从文学翻译开始的。

1918年高尔基在列宁的支持下创办了世界文学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任务是介绍世界名著,提高翻译艺术的水平,培养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有近百名教授、作家参加了这一工作。

该出版社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力量,审查世界名著的俄译本。为此,首先需要统一思想,对文学翻译理论进行探讨,规定一些明确的原则,以便在从事翻译实践和判断译文质量时有所遵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出版社成了苏联培养翻译人材和研究翻译理论的摇篮。

高尔基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楚科夫斯基(Чуковский К. И.)等人,但当时并无任何有关翻译理论的俄文专著。楚科

夫斯基经过短时间的努力,于1919年写了《文艺翻译的原则》(Принц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一书,其中谈到了小说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首次提出小说的译者应是艺术家,应是语言大师。楚科夫斯基力求通过翻译实践积极地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难题。他提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是:能否运用生动、丰富的俄罗斯语言复制原文的艺术特点。楚科夫斯基在这本小册子中论述的种种原则只能看作是苏联早期翻译理论的雏形。例如:“逐词准确地翻译,有时会导致对整个原文思想的歪曲。”今天看来,这个道理已经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当时却被楚科夫斯基当作一大发现,大书特书。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翻译界所流行的“复制原文的一切形式”和“逐词死译”的倾向,他的这种提法却又是针对性极强的。

当时,在文艺批评界和理论界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翻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根本无法达到绝对的“理想的”确切性。“理想的”确切性指的是,再现原文的一切形式成分及意思和修辞功能。这样来理解确切性显然是不现实的。它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发展都形成了障碍。

1930年《文艺翻译的原则》被收入楚科夫斯基的《翻译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文集。其中提出了翻译工作者必须了解社会环境。此外,还探讨了原文结构特点和修辞特点的传达问题,以及翻译表达的原则等等。

1934年翻译理论家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А. А.)在《翻译》Перевод^① 词条中,首次提出了“等同翻译”这一概念。他所谓的“等同翻译”,是指“传达原著的思想内容、感情和文字

① 见《苏联文学百科》(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第8卷。

结构”，换句话说，就是“传达原作者的全部创作意图”。这里不仅包括原作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包括原作者所运用的各种形象、色彩、节奏等。斯米尔诺夫认为，保持这些形象、色彩、节奏等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总体效果的手段。因此，翻译过程中有时就需要做出某些牺牲，舍弃原文中的某些次要因素。换句话说，翻译中不仅可以使用原文的直接对应物，而且也可以用原文的功能近似物来取代。

1936年洛金斯基(Лозинский М. Л.)在第一次全苏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译诗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中指出：译诗应当使读者产生与原诗读者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译诗应当在美学方面同原诗等值，突出了在文艺翻译方面等同性的美学功能。

1939年芬克尔(Финкель А. М.)在《论翻译理论的某些问题》(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概念，并论证了可译性问题。不足的是，他的论述偏重于哲学理论的探讨，而很少通过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实例加以证实。

20世纪30年代，某些高校教师和翻译工作者为了总结教学和翻译工作经验并将之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或同事，也曾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例如，1934年列茨克尔(Рецкер Я. И.)撰写了《技术翻译方法》(Методика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1932~1938莫罗佐夫(Морозов М. М.)编写了《英俄科技翻译技术》(Техника перевода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1932~1936年他又编写了《德俄科技翻译理论与实践》(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 немецкой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1937~1941再

版)等等。

1936年,卡什金(Кашкин И. А.)提出了现实主义翻译理论,成了苏联现实主义翻译理论的创始人。他把现实主义翻译方法归结为:翻译工作者应尽力再现原文用文字表达的客观现实,而不是词句;应从原文词句背后,看到并体会现象、思想、事物、动作和状态,忠实、完整、具体地再现作者眼中的现实。他把现实主义的翻译方法等同于文学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他被誉为“代表俄国翻译史上整整一个时代”的理论家。他认为翻译工作者要做到三忠于,即忠于原作,忠于读者,忠于现实,而且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卡什金非常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翻译工作者如果没有理论,就只能是一个匠人,而永远不能成为翻译家、艺术家。翻译工作者应当在理论的指导下把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一些规律和成就运用于翻译实践。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理论的作用在于使他能自觉地,正确地理解自己的目标和任务。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争取达到等值翻译的武器。

1941年楚科夫斯基对《翻译的艺术》一书又做了补充和修改,定名为《崇高的艺术》(Высо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书中侧重论证了翻译是一门艺术,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通过翻译中出现的大量笑话和“洋相”,批判了形形色色错误的翻译原则。作者以他作家兼诗人所特有的直觉,对有关翻译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做了精辟的剖析,但是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翻译理论,未能从理论上阐述文艺翻译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二战开始时为止,有关翻译理论的探讨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理论,而且它们基本上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的。只有翻译教科书和翻译教学参考书是例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

在苏联,对翻译理论的探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一度中断。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新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把翻译理论同对比语言学联系起来,在对比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揭示两种语言相互对应的规律。

1950 年《翻译教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ики учеб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问世,它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书中加里佩林(Гальперин И. Р.)的文章《翻译与修辞学》(Перевод и стилистика)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原文同莫罗佐夫(Морозов М. М.)的译文进行了对比,指出了英俄两种语言手段在意义功能和美学功能方面的异同。又如索伯列夫(Соболев Л. Н.)的文章《翻译中准确性的标准》(Мера точности в переводе)概述了翻译材料的主要类型分类,后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补充。列茨克尔(Рецкер Я. И.)的文章《谈外译俄中的规律性对应物》(О закономерных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х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на родной язык)把两种语言规律性对应物分为三大类:即等值、近似和等同替换。他指出,在科技翻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术语的等值物;翻译社会政治文章时,重要的是要找到近似物;翻译文学作品时,广泛采用的是等同替换手段。列茨克尔提出的规律性对应物这一概念及对应物的归类在翻译理论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1953 年费奥多罗夫(Фёдоров А. В. 此前被译为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一书问世,这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系统、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问题只能

在语言学领域内求得解决,因为任何体裁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于两种语言的对比。规定了“翻译”概念的内容,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内容等,分别论述了翻译的词汇问题,语法问题和文体问题。这本书使费奥多罗夫成了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奠基人。它在苏联翻译界,特别是翻译教学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也引起了与翻译理论界文艺学派的激烈争论。

来自文艺学派的意见认为,费氏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而忽视了文艺翻译首先涉及的是文艺学的问题。

应当说,费奥多罗夫《翻译理论概要》一书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界和翻译教学也有很大影响。

1954年,安托科尔斯基(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П.)、阿乌埃佐夫(Ауэзов М.)和雷利斯基(Рыльский М.)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苏联各民族的文艺翻译》的联合发言,指出费奥多罗夫的书留下了一个空白,即文艺翻译的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整个文艺翻译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应当把翻译视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应当从文艺学角度,而不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

1954年卡什金在《关于苏联文艺翻译的方法与学派》(О методе и школ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一文中提出,文艺翻译理论应是一门广义的语文学科,也就是说,应把对翻译的语言问题和文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1955年出版的《文艺翻译问题》(Вопрос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文集对费奥多罗夫的观点提出疑义,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有可能导致翻译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和逐词死译。

此后,苏联的翻译理论便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即文艺学

派和语言学派,两派长期争论不休,50年代中期以后和60年代达到了高潮,各自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技巧》(Мастер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集中反映了文艺学派的观点。语言学派则以巴尔胡达罗夫主编的《翻译工作者札记》(Тетрадь переводчика)(196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为喉舌发表议论,总结翻译经验。属于文艺学派的多为作家;属于语言学派的多为语言学家、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者。

1958年费奥多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第二版中对原书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尽管也承认翻译领域的问题不能全部通过语言学方法来解释,但仍坚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翻译艺术的真正理论。他强调指出,文艺翻译确有其特点,应突出其美学方面,但是文学形象是用语言手段创造的,也必须用另一种语言的手段来传达,因此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是基础。并在书名上加了副标题《语言学问题》,目的是说明该书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仅限于语言问题。

1962年《翻译理论和评论》(Теория и кри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文集问世,该书的作者包括了两派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拉林(Ларин Б. А.)在该文集的序言《我们的任务》(Наши задачи)中提出,必须在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基础上建立文艺翻译理论。他认为,不把语言学和文艺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是语文学,修辞学,还是翻译理论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翻译都应始于语文分析,而终于文学创作。

1963年艾特金(Эткин Е. Г.)发表《诗歌与翻译》(Поэзия и перевод)一书,该书对19世纪初到当时为止的大量外译俄的诗译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涉及到文艺翻译各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诗译的语言手段与再现的原诗艺术特征密

切相关,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翻译有如修辞学,既是文艺学问题,又是语言学问题,因为修辞学是关于语言同义手段的科学,它同时属于语文学的两个领域。忽视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理论,实际上会使翻译工作者束手无策”。

1964年,加切奇拉泽(Гачечиладзе Г. Р.)发表了《文艺翻译理论问题》(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一书,在书中他以列宁的反映论为依据,提出,对翻译工作者来说,直接反映对象是原文,即原文的艺术现实,而不是原文直接反映的具体现实。

同年,列夫津(Ревзин И. И.)和罗森茨韦格(Розенцвейг В. Ю.)发表了《普通翻译和机器翻译原理》(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и маши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问题进行研究。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把翻译理论的概念和原理同结构语言学的范畴相结合的学术著作。

1968年费奥多罗夫根据新的情况对《翻译理论概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了该书第三版,并更名为《翻译通论基础》(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理由是,这样可以突出翻译通论的基本原则——对各种翻译现象和各类翻译进行研究,揭示它们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性,从语言的角度进行对比。在该书中费奥多罗夫明确地指出,决不应忘记最终的任务是建立共同的语文学理论。现在还坚持只有通过文艺学,或只有通过语言学的途径来研究文艺翻译,已经过时了。当代是不同的学科,有时是相距甚远的学科(语言学和数学)空前密切合作的时期。而在语文学中,文艺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其分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克服的,也就是说,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被称作苏联翻译理论的“丰收年代”,两